

知识分子图书馆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

〔美〕斯坦利·费什 著 文楚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美)费什著;文楚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196-6

I . 读… II . ①费… ②文… III . 新批评派-美国-文集
IV . I712. 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58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375 插页:4

字数:288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9. 00 元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 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汪民安 张旭东 章国锋 谢少波

F138/ef

总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费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萨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萨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生事物，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烨、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于北京

译者前言

人类即将告别 20 世纪，回顾近当代，特别是 20 世纪文学批评史，尽管流派纷呈，主义迭出，令人眼花缭乱，但特里·伊格尔顿的概括可以说十分精辟，“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粗略经历了三个阶段：专注作者（浪漫主义和 19 世纪）；专注文本（新批评）；近几十年又从文本转向读者。”（《文学理论导论》，明尼阿波尼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83 年英文版，第 74 页。）第三个阶段就是众所周知的以读者为指向的批评（Audience-Oriented Criticism），或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德国称之为“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由康斯坦茨学派的沃尔夫冈·伊瑟尔和汉斯·罗伯特·尧斯首先提出；在美国则称之为读者反应批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并已被批评界所接受。读者反应批评是对新批评派注重文本（文本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意义只存在于文本之中，无须读者参予，也排除了诸如对作者生平、生活经历、背景、作者对作品的看法等一切外在因素）的理论的一次反拨，其注意力从文本转向了读者。就此而言，不同名称的读者反应批评家取得了一致；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却有分歧。美国批评家简·汤姆金斯在其编辑的《读者反应批评：从形式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 年）的引言中指出，读者反应批评家的焦点集中于研究读者和阅读过程，其理论倾向却各个相异；他们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解构主义出发，对“读者”、“阐释”、“文本”所

下的定义明显有别。由于对文本的阐释、阅读经验、意义的生成都离不开读者，所以“什么是读者”又成为争论的中心。一致说来，这种“读者”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假想的读者（hypothetical reader）和实际的读者（real reader）。

假想的读者实际上是理想的读者（ideal reader）的别称之一。对理想的读者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法国批评家热拉尔·普兰斯（Gereld Prince）谓之“叙述接受者”（narratee）——即作品中作者直接转达其信息的对象——并进而引伸为“零度叙述接受者”（zero-degree narratee），即那种懂得叙述者的语言和语汇，具有一定语言能力，能够较为准确记忆被叙述的有关事件，并得出断言性结论的读者。简言之，不论这种读者在文本中是否明确出现，他却是文本中的一个人物，在作者（叙述者）和真正的读者之间担任中介调停（mediate）的角色。这种读者同伊瑟尔所主张的“隐在的读者”（implied reader）——这一提法出自韦恩·布思《小说修辞学》，但伊瑟尔作了新的界定，是一种超验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读者，是一种文本结构，并促使文本结构现实化——有别，同美国批评家吉布森（Gibson）所提出的“冒牌读者”（mock reader）也不尽相同。后两种并非真实存在的读者，而是作者在其作品中所要求的那种能够体验文本“意义”或者使文本产生“意义”（即现实化）的读者。还有一种是乔纳森·卡勒根据他的“文学能力”概念所提出的“有能力的读者”。斯坦利·费什所主张的“有知识的读者”——见收入本书中的《读者中的文学：感受文体学》——与卡勒的观点相似，都指那种能够描述由社会所制约的阐释技巧并且具有内在化了的语言文学能力的读者，实际上是一种学者化的读者。此外“超级读者”、“合格的读者”等也可归于此类理想化了的读者。

与此相反，另一类读者反应批评家则强调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实际存在的读者，即阅读作品文本的普通读者。他们对作品的反应与阅读经验也许更有实践意义。然而，即使这类实际读

者，由于批评家的方法和理论视角不同，也是众说纷纭。诺曼·霍兰德着重于个别读者及他们对作者的反应，他在《五个读者的阅读》中通过研究个别学生对福克纳《献给爱米莉的玫瑰花》的分析，揭示出学生的心理机制如何决定了他们的反应。

对“什么是读者”的争论说明这一问题相当复杂，不可回避。但不论有何分歧，读者反应批评家都注重语言和阅读过程，因此拓宽了文学研究及文学批评领域，引发出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文本与读者、文本意义的建构乃至文学价值等一些本质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重新评论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既然强调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自我意识，又断言意义是特定情势下产生的（整个社会可以说亦是一个文本），所以读者反应批评发展的趋势（实际也如此）势必要涉及到与文学有关的社会、政治、文化话语。读者参与文本的体验/活动也就势必同体制本身、权力、乃至社会道德规范等相联系。当今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缺陷是过于理论化而脱离实际，而读者反应批评应该说是最富于实践性的批评模式之一。尽管它自身也同其他模式一样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仍将有持续的生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对读者反应批评的译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作为当代读者反应批评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费什1936年出生于美国罗得岛普罗维登斯；1959年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获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62年在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约翰·斯克尔顿的诗》（John Skelton's Poetry, 1965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受到当时仍在势头上的新批评派的影响，但已显示出日后同新批评派和形式主义分道扬镳的端倪。他思维敏捷，善于思辨，从古典以及中世纪修辞理论出发，通过细读文本，引经据典，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个诗人斯克尔顿的诗作进行了相当精辟的分析。后来，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霍普金斯大学任

教。1985年去杜克大学英文系，担任过系主任。至今仍在杜克大学英文系和法学院执教。

1967年，费什出版了第二部著作《为罪恶所震惊：〈失乐园〉中的读者》，对弥尔顿最难理解的长诗《失乐园》如何使读者以各自的方式去感受进行了探讨。他力图阐明“史诗声音”（epic voice）如何给读者设置下一个又一个陷阱；仔细考察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在这一时刻或那一时刻的阅读经验，“应当认为，《失乐园》是亚当失败时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清单。弥尔顿在长诗中所使用的策略是使读者意识到他自己参与的角色，驱使他怀疑自己的反应的正确性”。简言之，费什意在通过读者对文本的颠覆，摧毁读者对于自己知觉的过于自信，从而说明文本的不确定性。60年代末期，这一论点受到新批评派理论家的抨击，斥之为“危险的”观点，堕入了“感受谬误”。费什并没有后退，反而在其第三部著作《自我消受的制品：十七世纪文学阅读经验》中进一步将这一关注读者经验的方法引入对其他诗歌的分析，试图说明其运用的普遍性（所有诗歌、小说、戏剧作品都离不开读者的参与），重申读者的阅读体验，而不是“文本本身”理所当然地成为分析的客体，并产生意义。这部著作被提名为1972年美国全国图书奖候选名单，进一步奠定了费什作为读者反应批评家的声誉。

1980年，费什的论文集《这门课里有没有文本？阐释团体的权威》问世，当年便售出二万册，这在学术著作中已是颇高的数字。题目本身表明作者观点的变化：语言和文本的事实是解释的产物，而不是解释的客体。论文集中最为代表性的是《读者中的文学：感受性文体学》及《阐释集注本》（*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他的结论是“读者制造了（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并无政治意义）他在文本中所看到的一切”。

费什还写过许多其他涉及文学批评和法律的论文。1994年出版了《没有自由言论这回事，这也确实是件好事》，开始关注文本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这里翻译的自选集七篇论文中，除《批评的

自我意识或者我们能否理解我们正在做的事》及《实用主义与文学理论》之外，均选自上面提到的重要著作，可以说反映了费什对读者反应批评模式及相关文学批评领域的主要观点：

(一) 意义即事件：费什认为“阅读是一种活动，是一件你正在做的事”。因此阅读这一行为或活动必须在读者参与下进行。面对文本的一个句子，人们一般习惯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费什认为这一问题可用“这句话做了什么？”来代替。这一改变表明读者面前书页上的一个句子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成为一个事件(event)，而正是这一事件，这一正在发生的事件本身——不是任何对它所叙述的内容的描述，也不是读者从中得到的任何信息——才是这个句子所表达的意思。这就是说，读者的阅读体验是对文本事实的一种反应。文本作为一种陈述，一种策略是对读者发生作用的行为，不是读者可以从中获取信息的贮存物。由此，他提出了一种基于时间流意义上的一种不间断的反应式分析/阅读体验，即读者是按照阅读经验中的时间流动而不是对整个文字作出反应：读者总是在某一时刻读到第一个词，然后又在其他时刻读到第二个、第三个词，一直如此下去；正是发生在词与词之间以及读者头脑中的非肉眼所看见的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这话做了什么”构成了其意义。

(二) 解释团体：费什认为“意义既不是确定的以及稳定的文本的特征，也不是不受约束的或者独立的读者所具有的属性，而是解释团体所共有的特征。”这一问题的前提是，既然是读者制造了文本的意义，那么，不同的读者就必然会对同一文本制造出不同的意义(文本的客观性已被取消)。针对这一置疑，费什提出他所说的读者是“有知识的读者”，类似阅读培根、弥尔顿作品的那种合格的读者及卡勒所要求的“有文学能力的读者”——显然都是理想的学者化的读者。对于这类读者，意义的生成也就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而这是由阐释团体来达到的。阐释团体既决定一个读者(阅读)的活动的形态，也制约了这些活动所制造的文

本。他多次对“阐释团体”进行描述，这是一种理解结构，一种在集体意义上的自我（阅读）所依存的情势。具体说，“我们所进行的思维行为是由我们已经牢固生成的规范和习惯所制约的。这些规范习惯的存在，实际上先于我们的思维行为，只有置身在它们之中，我们才可觅到一条路径，以便获得由它们所确立起来的公众普遍认可的而且符合习惯的意义。”可见，“解释团体”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社会化的公众理解系统。在这一系统范围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会受到制约；但它也适应读者、向读者提供理解范畴；而读者反过来使其理解范畴同其个人面对的客体（文本）相适应。这一概念似乎很玄乎，但是他自己作了浅易的说明，“当我打开一本书看的时候，实际上我看到的是由我已经构成的观点写出的东西，也就是我二十五年来在文学团体中所形成的结构。这是一种活动和一种团体。另一种是所谓理论的或哲学的团体。……当你看书时，把一本书打开，把面前书页上的文字加以组织，这时一种历史的、特定的阐释就会加入你的理解，这并不是说你要把自己看成是历史地进入这个团体，而是你已经和这个团体融为一体，你没有反应就这样做了。”^①

（三）反对理论（Against Theory）：这一提法最初出自斯蒂文·克莱普和本·迈克尔斯的同名著作，并成为批评术语，反映了一些批评家对当前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远离实践、日趋“理论化”的一种厌恶情绪。费什赞同这一观点，问题其实是何谓理论？什么能有资格称之为理论？克莱普和迈克尔斯认为，“所谓‘理论’我们是指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特殊项目，试图对特定的具体文本的解释进行制约，是借助于一般性的解释进行描述而实现的。”一般性的阐释同仅凭经验主义的、而非理论的方法的局部阐释不同，它是在任何时候都真实可靠的、具有概括性的准则。费什认为“普遍性（概括性）取代地方性（局部性）从来没有而且永远

^① 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

也不会办到。所谓理论是一件永远不可企及的事。因为使理论能够被确定的、必不可少的，基本的、第一手资料以及符合规范的法则将总被发现。”因此，现今的所谓理论，如女权主义、精神分析都不能称之为理论。因为它们不过是把在特殊（局部）领域内所发生的利害关系（地方的、个别的、宗派集团的）提高到普遍性的位置，只不过是一些信仰观念、推测和借用了理论的术语和内容而已，而信仰、观念之类的范畴不能称之为理论，即使带有普遍性；因为这种信仰或声称是理论的东西所引发的结果只能是经验主义的概括性，而非一般意义的解释；或者只是对某一有影响的实践行为的模仿。他认为哲学是理论，但人们往往把文学批评和哲学混同起来。文学理论应该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所谓理论之所以成为一种时髦，是因为理论能够引出其他实践所得出的政治及体制方面的结果：如宣传、提升、荣誉、更多的出版物，专题讲座、进入词条等等。理论希望（theory hope）和理论畏惧（theory fear）同时并存。这是一个悖论，但却是对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及理论趋势的概括。

阅读费什的著作，把握他的思路，理解其观点并不是轻松的事（涉及到哲学、文学、语言学以及政治、宗教、法律等诸多领域）。正如他所说，他对于文学研究的现状认识是由诸多因素（经历、教育、专业训练、学术信仰等等）作用的结果。他的某些观点、诸如对理论本身、理论与实践、理论的结果等似乎有些偏颇，但他不囿于权威以及经典之说，而是进行独立思考，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真知灼见，因此较之有一些自封为理论实则是“伪理论”的东西，他的观点对我们了解西方当代文学批评模式无疑是更有价值的。

费什认为，其实读者反应批评也不是理论，甚至不是一种方法，而只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实践形式。在我国，对读者反应批评模式的介绍、评价相对薄弱，对费什的评价更为不足。鉴于此，1992年底，应友人王逢振先生之邀，我开始翻译费什的这本自选集，亦

得到费什的支持。在给笔者的信中他说，“我由衷感谢你翻译我的著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非常遗憾，我恐怕永远也不能用你们的语言来阅读我自己的作品了。”不过，学术无疆界。他的著作借助于翻译能被中国研究者/读者阅读，并从中吸取教益一定能使他欣慰。1994年译事才完成，其中艰辛不必赘述；费什知识渊博，语言艰涩。在阅读—理解—表达—翻译过程中（这本身就是一种阅读经验），我常常被置于他的文本陷阱中，不得不小心翼翼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翻译亦是用另一种文字对原文文本进行解释）。对于所涉及的有关大量人名、著作、典故、背景亦尽可能给予注释，可以说作了最大努力；若干术语附以英文以资对照，尽管如此，失误一定难免，恳请批评指正。最后对作者、王逢振兄，以及本书责任编辑汪民安先生的帮助、支持表示由衷谢忱。

文楚安

1997. 7. 30.

于成都华西坝怡园